

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空间

范力奇 14307110256 化学系

摘要 公元前 3 世纪，亚历山大三世的东征及随后托勒密埃及等继业者国家的形成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作为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以其在文化和贸易发展中的地位为人熟知。本文将从托勒密时代的背景出发，对照古典时期的其他希腊城市，讨论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及其原因。

0. 引言

公元前 320 年，托勒密一世将王国首都自孟菲斯迁至亚历山大里亚，这座亚历山大建立于公元前 331 年的城市随后成为希腊化世界的文明中心。然而，由于君主制统治在继业者国家的普遍¹，长期以来塞琉古、托勒密等政权被认为是相对于古典时代雅典政制的倒退。部分观点认为，托勒密王朝是希腊、埃及以及犹太民族间相融合的过程²；也有研究者指出，考虑到政权的组织形态，相比于称之为“希腊化的埃及”，更恰当的称呼是“希腊的埃及化”³。城市在古希腊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有“地中海女王”之称，本文将结合现有的对托勒密朝政制、文化的记载，试对托勒密埃及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空间形态进行讨论。

1. 托勒密埃及的早期政制

马其顿历史上的政治体制能为托勒密王朝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内容。不同于当时希腊世界的众多城邦，马其顿王族不仅对各地拥有宣称的宗主权，同时“各市镇地区仍然是国王治下的行政单位，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⁴。在马其顿崛起的过程中，虽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区保持原有城邦的制度，但同时国王通过土地分封的方式分割城邦的土地。

马其顿传统之外，埃及自身的政权特点也对托勒密王朝的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前，一般认为埃及的社会模式为法老统治的王权制度，对古埃及诸王朝的划分乃至历代统治者的考证亦受到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努比亚王朝或波斯占领埃及的时期，当地名义上实行的仍是埃及法老的统治，可见君主专制在古埃及具有深厚的传统，这一传统也被托勒密王朝所继承。

¹ 杨巨平：《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与特点》，《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4（1991），第 71-77 页。

²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339 页。

³ 张春梅：《从托勒密埃及的统治模式看“希腊化”》，《唐都学刊》，第 22 卷第 5 期（2006），第 114-118 页。

⁴ 哈蒙德（N. G. L. Hammond）：《希腊史》，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857 页。

针对托勒密王朝的专制政治,《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⁵进行了详尽的综述和分析。作为亚历山大的贴身护卫及舰队司令,托勒密一世在取得埃及总督的权力后,劫持亚历山大的尸体并引发了第一次继业者战争,巩固了自己在埃及的统治地位,随后进行了征服昔兰尼等军事活动以保障安全。托勒密一世在位期间对埃及人采取柔和的政策,并试图将埃及与希腊的宗教相融合。托勒密一世之后王朝早期的君主进一步强化王权,托勒密二世对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一世的作战使统治范围得到扩大,托勒密三世终结了昔兰尼与埃及的分裂。托勒密王朝早期君主的成就使得王朝的专制王权达到鼎盛,不仅疆域扩大,且自行政立法司法乃至军事外交等权力,均被君主所紧密控制,而埃及的新首都亚历山大里亚也在此期间得到建设和发展。同时,作者也对托勒密王朝国王的神化进行了分析⁶,认为基于“法老埃及的王权传统、希腊人对王权的潜意识认同、马其顿人的君主制传统、西亚移民的专制统治经验”,托勒密王朝君主实现了国王人格的神化。

2. 古典时代的希腊城市:雅典和米利都

作为希腊的重要城邦,雅典的城市格局和公共空间一直以来被人重视,山巅的卫城之下有集市广场和赫斯菲托斯神庙等,另一侧则是狄奥尼索斯剧场。雅典的城市结构被认为和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集市广场,在政治外同样具有贸易和其他社会生活的功能。随着梭伦和克里斯提尼先后进行的改革,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逐渐加强,依托于神庙而建设的广场同样为其赋予了神圣性。有建筑学学者认为,“古希腊城市广场是有意识的空间设置”⁷。但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广场等城市空间在城邦的共同体意识中同样发生作用。

事实上,古希腊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有自身独特的认知。根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记载⁸,来自米利都的希波达莫斯(Hippodamus of Miletus)是城市规划的先驱,(米利都(Miletus)是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爱奥尼亚诸城邦之一)。他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有1万名男性自由民,而总人口包括女性、儿童和奴隶将达到5万人。同时,希波达莫斯研究了城市的功能问题,并将其与国家管理体系联系起来。公民被分为士兵,工匠和农民三类,土地也分为三类(神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批评在希波达莫斯的人口划分思想,认为其将导致武装力量被垄断,使农夫和工匠受到压迫,

⁵ 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⁶ 同注5,第82-96页。

⁷ 蔡永洁:《空间的权利与权力的空间——欧洲城市广场历史演变的社会学观察》,《建筑学报》第6期(2006),第38页。

⁸ Aristotle, *Politics*, ii.8. 1267b.

然而据亚里士多德记载，他是第一个试图进行适当的城市空间布局的城市规划师。希波达莫斯的城市建设思想在众多希腊城市规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是米利都的重建。

经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后，公元前 479 年随着普拉提亚战役中希腊人的胜利，米利都重归希腊人之下，并重新进行规划设计。希波达莫斯的路网规划包括一系列宽而直的以直角相交的街道，网状交织将城市平均分成多个方块，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高低之分。同时引人注目的一个相对广阔的中心街区，据希波达莫斯估计，这个街区将一直得到发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集市广场（Agora），起到城市生活中心的作用。在随后的时间里，这座爱奥尼亚城市逐渐重新焕发生机，与原先的宏伟设计相一致。“这是古代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的发展方式，适应了日渐繁荣的商业和来自王室的建设，同时并不会超出最初的布局”。⁹

自发形成的雅典是不经特定规划的，由社会生活所构成的城市架构为雅典日渐丰富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和中心，反哺了城邦的共同体意识；而米利都的设计和落成，则是理性思想的一次体现。对于随后兴起的希腊化世界诸城市，雅典和米利都各自的形貌和发展历程是可参与讨论的比较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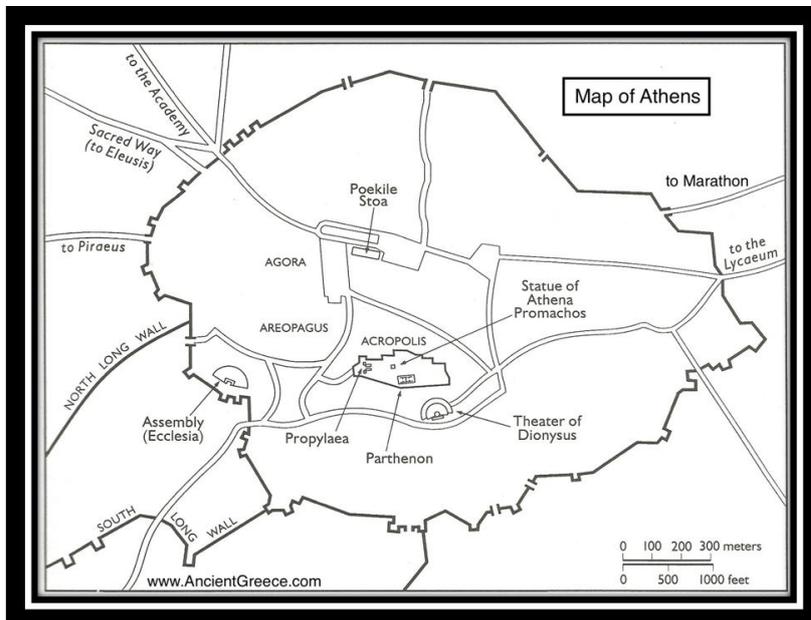


图 1 古代雅典城市示意图

⁹ Francois Chamoux, Translated by Michel Roussel,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P264-P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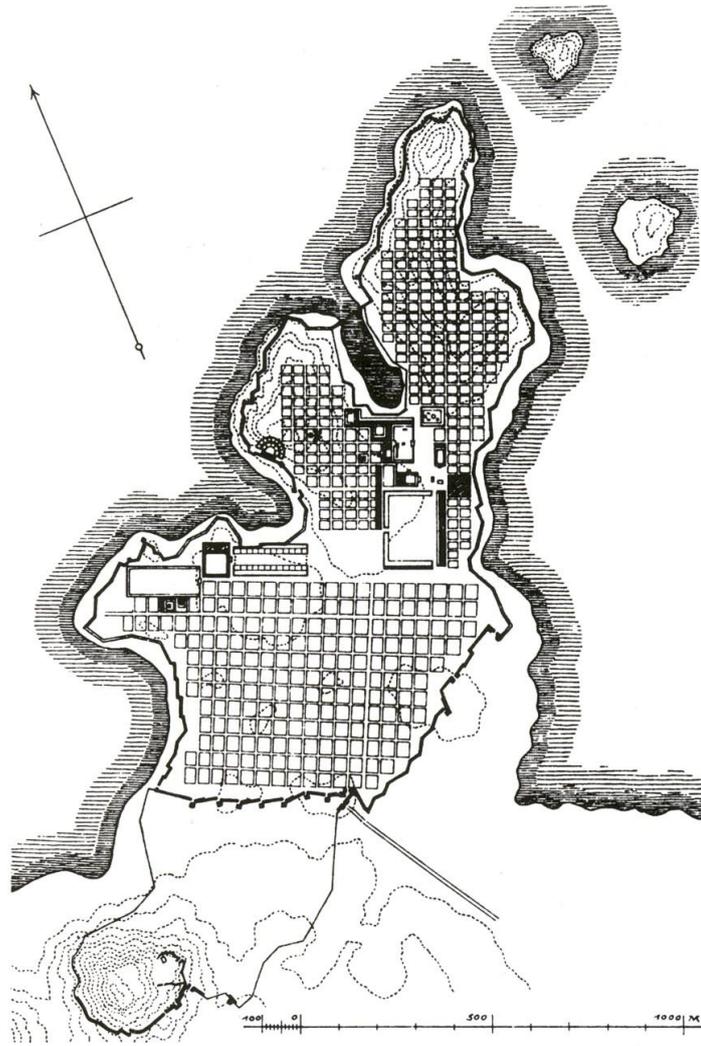


图2 亚历山大规划示意图

3. 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里亚城市形态

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三世时，狄诺克拉底主持之下亚历山大港的城市设计初步完成。据《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的建筑》引述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记载¹⁰，亚历山大本人详细地规划了城市内部的道路乃至法罗斯（Pharos）港周边街道的朝向角度，同一著作中作者转述阿里安的记载亦提到亚历山大亲自确定了集市广场（Argos）和众多神庙的选址。事实上，托勒密王朝迁都后亚历山大里亚的建设和积累是逐步完成的，城市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周边的三角洲¹¹。尽管亚历山大三世对亚历山大里亚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规划，相应的建设只有在托勒密一世取得埃及地区的统治权后才得以完成，著名的世界奇迹之一，亚历山大港灯塔则于托勒密二世在位期间落成。

¹⁰ Judith McKenzie, *The architecture of Alexandria and Egypt, C. 300 B.C. to A.D. 7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Vol. 63, P38.

¹¹ Alan K Bowman, *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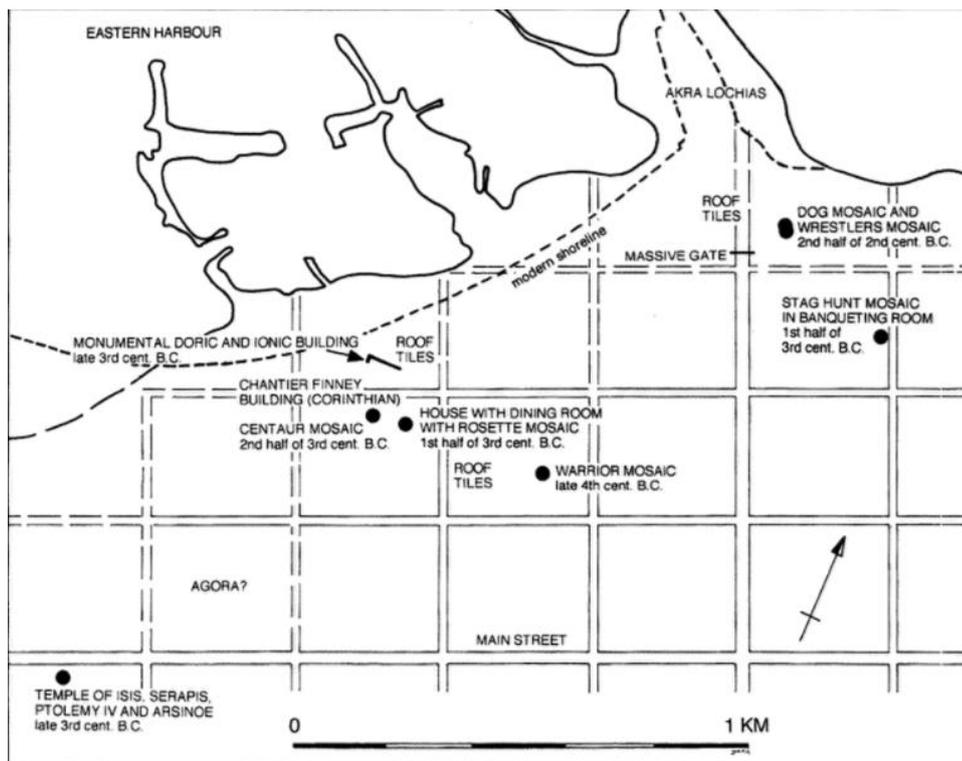


图3 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亚历山大里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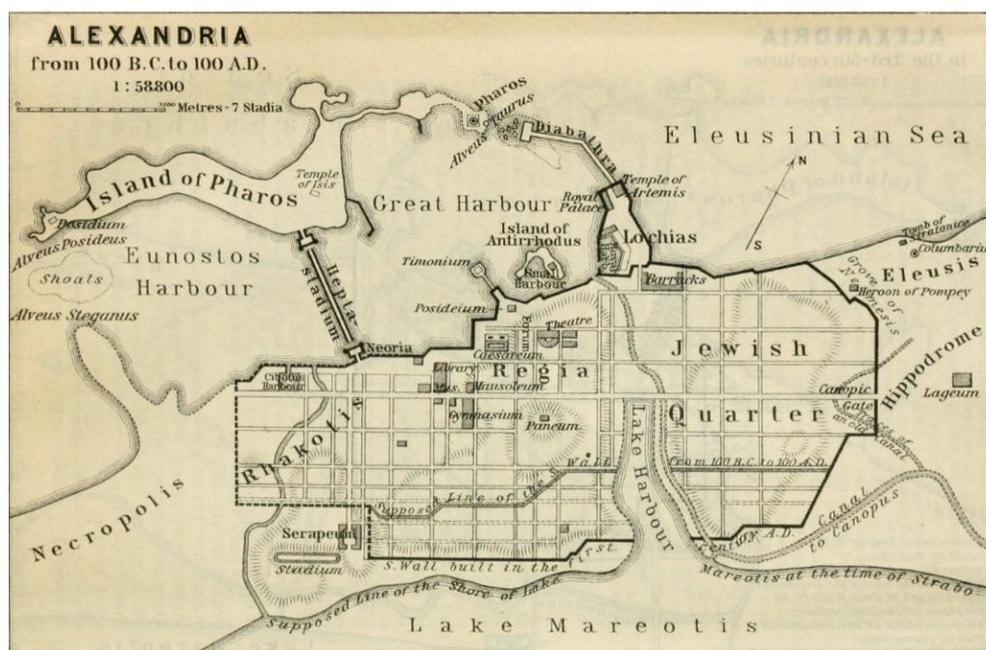


图4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

亚历山大里亚城周长约为 14.4 千米，根据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的记载¹²，“它的两条长边沐浴着两个大海，直径约 30 斯塔德，两条短边是地峡，每边宽约 7-8 斯塔德，一边与大海，另一边与湖泊相连。整个城市街道纵横交叉，可以容纳骑马者和马车通过，

¹² 斯特拉波 (Strabo)：《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版，P1145。

有两条很宽的、宽度超过 1 普勒斯伦的大街彼此十字交叉，把城市平分为两半，这座城市包括许多美丽的公共区域，还有王宫，王宫占据了全城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面积；由于每位国王出于喜好奢华，通常都会为公众建筑增添某些装饰”。

城市中的居民结构按民族分为不同的区域，西部为埃及区拉克提斯（Rhakotis），东部为犹太社区，而王宫所在的城市中部则为希腊人的主要住所。马其顿和希腊人在城市之中仅占少数，绝大部分居民是埃及本土人¹³。

但是，亚历山大里亚最为人所熟知的建筑是博学园和图书馆，以及法罗斯的灯塔。然而斯特拉波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并没有记载，对博学园，“博物馆（注：汉译版如此，或应作博学园或缪斯神殿）也是王宫的一部分，它有公众散步的地方和半敞开式带座椅的建筑物，还有一个大房间，一个供博物馆学者们使用的公共餐厅”。如果说博学园主要是科学研究的场所，那么亚历山大图书馆则是文化研究的中心。

斯特拉波对亚历山大里亚的描述还涉及到传统希腊城市中的神庙、竞技场等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西部的塞拉比斯神庙（Serapeum）。托勒密一世引入了对塞拉比斯神（Serapis）的崇拜，作为统一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手段。塞拉比斯具有希腊式的外表，但是以埃及的方式装饰，并且结合了许多其他元素，而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比斯神庙由托勒密三世建造。

这一时期，相比于雅典等早期希腊城邦丰富的公民政治生活所带来的，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可以发现，占据城市中重要位置的场所，无论是图书馆、博学园乃至塞拉比斯神庙，这些建筑均是王权之下官方意志的体现。

4. 对亚历山大里亚和其他希腊化世界城市的讨论

在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方面，有观点认为，“到了希腊化时代，古典时期的城邦公共生活建筑让位于王公和君主的建筑；炫耀财富、政治特权和凭借政治经济权力谋取艺术品的欲望强烈地干扰着古典城邦的建筑所注重的比例和均衡”¹⁴。诚然，托勒密埃及君主制的性质决定了城邦自主权的逐步丧失，“城市的自治权是有限的，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权，经济决策也受到国家的绝对干预。希腊市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城市的自治，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即便如此，亚历山大里亚还是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失去了城市议会”¹⁵。但是，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代表的希腊化时期城市规模和建筑规格的日益扩大和有序性的

¹³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和文化》，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 2012 年版，P27。

¹⁴ 同注 2，第 336 页。

¹⁵ 同注 3，第 114 页。

提高，与上述政治层面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正如前文讨论，从雅典和米利都两城的区别来看，从自发形成城市结构和公共生活空间的雅典，到依照网格状设计思想进行规划的米利都，包括同期的其他希腊世界的城市，可以发现人为控制的成分在城市建设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虽然亚历山大里亚等希腊化城市确实存在公民大会、市政会议的弱化甚至成为装饰等情况，但将城市格局和建筑规模的变化归因于政制变迁，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王权对于权力和财富的炫耀更多体现在装饰性上。同时，作为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科技的发展均不可忽视：港口的地位为城市（主要是王室）带来繁荣和财富，资本的积累使建筑的装饰和城市格局的扩大成为可能；而技术领域，虽然原始文献中对于建筑技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但法罗斯灯塔曾经的存在足以说明，当时的技术条件足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建筑，城市和建筑规模的扩大很可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再者，能否从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形态角度出发，进行对托勒密政权是“希腊的”“东方的”“融合的”的定性，依然有待考究。首先，各民族聚居地在城市中泾渭分明，上层王宫周边的马其顿-希腊人与东西两侧广大埃及平民、犹太裔之间的交流在表现层面并不显著，法律层面的分别或许可以侧面说明：“托勒密王朝的法律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即外来统治者的城市法与埃及本土法律并行发展”¹⁶。其次必须考虑埃及的环境包括宗教传统对托勒密王朝的影响。塞拉比斯神庙等建筑可以说明，埃及传统宗教在托勒密时代的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从亚历山大三世的“阿蒙-拉”神自我神化到托勒密王朝的塞拉比斯崇拜，埃及传统宗教在希腊化时代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出于赋予自身执政合法性的考量。开启希腊化史研究的德罗伊森将亚历山大的征服史、包括亚历山大对波斯等被征服地原有习惯的融入更多地视作民族之间融合的开启，在时代条件有其殖民史观的局限性，在后世研究者看来，对广大征服疆域实施有效的统治，或许是文化层面上亚历山大三世和其后希腊化国家所采取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必须注意的是，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研究中必须留意到其在希腊化世界中的独特地位。首先，亚历山大里亚之外的托勒密埃及本土并没有建立大量的城市，其城市的建设主要集中于利比亚的昔兰尼加、塞浦路斯乃至阿拉伯海岸等地¹⁷，埃及本土的社会形态与其之前的王朝并无明显变化。同时，从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到地中海沿岸的托勒密、塞琉古，不同的希腊化国家中的城市进行比较，必须考虑其所在国家自身的特性，例如

¹⁶ 同注 5，第 202 页。

¹⁷ 同注 2，第 327 页。

塞琉古王国中的城市自治权，相比于托勒密治下的埃及，一般认为仍有较好的保留¹⁸。

亚历山大里亚的特殊地位同样与其所处位置直接相关，贸易与科技文化的繁荣对城市的形态有直接影响。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仅为托勒密王国的亚历山大里亚，对同时期其他希腊化城市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5. 结论

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地中海沿岸的贸易中心和马其顿-希腊在埃及统治的重要据点，在城市建设上延续了古典时期已经开始的网格状规划思想，同时保留了传统城市格局中的神庙、竞技场等公共空间，将其视作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结果有失偏颇；建筑中装饰性元素被大量运用，同时在神庙的宗教性上向埃及传统宗教靠拢以加强统治。但是必须注意，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流文化依然是统治者的希腊文化，希腊、埃及与犹太人之间的文化“融合”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此外城市空间中图书馆、博学院等科技文化场所地位显著上升，为科学和文化的繁荣提供基础。同时，亚历山大里亚在当时的希腊化世界中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应被留意并与其他城市和广大埃及农村地区进行区别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巨平：《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与特点》，《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4（1991），第71-77页。
2. 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 张春梅：《从托勒密埃及的统治模式看“希腊化”》，《唐都学刊》，第22卷第5期（2006），第114-118页。
4. 哈蒙德（N. G. L. Hammond）：《希腊史》，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5. 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6. 蔡永洁：《空间的权利与权力的空间——欧洲城市广场历史演变的社会学观察》，《建筑学报》第6期（2006），第37-40页。
7. Aristotle, *Politics*.
8. Francois Chamoux, Translated by Michel Rousset,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9. Judith McKenzie, *The architecture of Alexandria and Egypt, C. 300 B.C. to A.D. 7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 Alan K Bowman, *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1. 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12.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和文化》，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¹⁸ 同注1，第6页。